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Big Event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现代国际传播大事件 ——案例与分析

赵雪波 周 哲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M&S

媒介与社会书系(第三辑)

*Big Events of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现代国际传播大事件 ——案例与分析

赵雪波 周 哲 著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国际传播大事件:案例与分析/赵雪波,周哲著.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657-0854-1

I. ①现… II. ①赵… ②周… III. ①国际新闻—新闻报道—案例—现代
IV. ①G21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4104 号



现代国际传播大事件——案例与分析

著 者 赵雪波 周 哲

责任编辑 范明懿

责任印制 曹 辉

封面制作 泰博瑞国际文化传媒

出 版 人 蔡 翔

出版发行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1号 邮编:100024

电 话 86—10—65450528 65450532 传真: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uc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蝶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mm 1/16

印 张 15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657-0854-1/G·0854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序 言

国际传播从字面理解是一种传播形态,是发生在国际社会之间特别是国家之间的传播活动,一般而言其传播的主体是国家传播媒介或具有在国际范围内进行传播活动的大型媒体;传播的客体是超出国界的世界范围内的受众;传播的内容可能是关于媒体所在国的也可能是他国的;传播的影响和效果边际则绝对是国际性的。这是用传播学的属性理论对国际传播的理解。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简单的话,当然很省事,但是当我们面对某一个相对独立的具有国际性质的传播事件时,我们马上就会发现以上那种分析根本无助于我们对事件进行透彻的把握和理解。这说明在这些事件的背后有着更隐秘的打开事件迷宫之锁的钥匙。这把钥匙其实就是国际传播所固有的两个元素——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这是一把组合钥匙,打开迷宫之锁必须同时具备这两把钥匙。或者说,如果把每一个国际传播事件看作是一团迷雾的话,我们需要分别揭开覆盖在它身上的大众传播面纱和国际关系面纱。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大众传播的身影、触须无处不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国际关系领域。而另一方面,大部分人仍然把国际关系领域看作是一个比较封闭的领域,一提起国际关系这个概念,就会有一种讳莫如深的感觉,更不会把它与大众传播这样不相干的概念联系起来。其实,大众传播也好,大众媒介也好,都与国际关系有着很深的渊源。到了今天,在大众传播

高度发达的时代,它的身影和触须在国际关系领域里已经是无处不在了。有的时候你无法辨别某一个国际事件究竟是一个受到传媒影响的事件,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传媒事件。在一些国际事件中,传媒的影响贯穿始终——从事件的发端到进程的方向,再到事件的结局。

从整体上看,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以不同的形式联系在一起。

首先是影响。许多事件的发生直接是由传媒的报道引发的,比如美军亵渎《古兰经》事件、凯利事件等等。有些事件的发生则可能间接地受到了传媒的影响,或者说传媒加快了事件发生的速度,比如科索沃战争、美西战争等等。在一些国际事件中,传媒成为了积极的参与者,比如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等。传媒从最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介入战争报道了,从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传媒的全面介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战争已经离不开传媒了,而海湾战争之后政府和军方已经开始有“预谋”、有计划地利用传媒、处理与媒体的公共关系了。当然,媒体自身一刻也没有放松主动地去接近战争。它有的时候会对战争或其他国际事件的进程方向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最典型的事例当属传媒影响越南战争的结束,此外还有美军在索马里军事行动的中止。

其次是在国际事件或外交决策中的参与。传媒参与一些国际事件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们甚至不得不承认,任何的国际事件都会有传媒的参与,这直接地表现为大小媒体对各种国际事件的积极报道。如果这还不能被看作是参与的话,在外交决策过程中媒体的表现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参与。在一些决策机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决策层已经注意到在作出决定之前广揽各界的意见,其中包括媒体的意见。媒体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关系正在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另外,在越来越多的国际事件中传媒自身成为了事件的主角。大部分情况下,媒体只是国际事件的旁观者、参与者,最多是一个配角。但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传媒正在进入国际关系漩涡的核心。在“美军亵渎《古兰经》”、“虐囚门”等事件中,媒体既是导演,又是主角。而在“丹麦漫画”和“电影风暴”等事件中,媒体完全演变为主角了。而在“窃听丑闻”、“维基解密”事件中,媒体已然是演出一幕独角戏。BBC和半岛电视台的故事则说明

即使它们不去掺和什么外交活动或国际事件,它们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当然它们必然要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主角,一次次演绎出离奇的故事。所以说,如果把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整体表现联系起来观察,从更大的程度上讲,传媒已经是一种国际关系行为体了。传统的国际关系正在泛化,各种力量、角色纷纷进入国际关系,最终改变了国际关系行为体的构成。因此在判断大众传媒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扮演时,确实很难断定它究竟是主角还是配角。也许有的时候是主角,有的时候是配角,有的时候则游离于两者之间。

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的关系不是一两句话能说得清的,也不是用一两件事例能够说得清的。反过来讲,在许多国际事件中,分析传媒的因素也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必须对每一个过程作具体而详细的分析,才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否则就是牵强附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有许多“定论”也有待重新对其进行考究。比如,有一种定论认为赫斯特在墨西哥战争的爆发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的人甚至认为赫斯特“发动”了那场战争。但是,美国总统麦金莱在决定发动那场战争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赫斯特的鼓动或暗示,这应该是我们追根溯源的方向。这种研究可能是一项艰难的工程,因为研究者不得不从决策者们的只言片语中去搜集信息。事实上,决策者们未必会承认他们的决策受到了媒体的影响,以表明自己在作出决定时是清醒的和有能力的。媒体也不一定会肯定自己对某项决策或某个事件产生了影响,以免把自己推向风口浪尖。许多材料证明,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一些利益集团和智囊团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那我们就更难判断究竟是不是媒体“一家”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是无论如何,媒体就在那里,它确实实地产生了影响和作用。

本书提供了一些可供研究的范例,这些范例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代表性的国际事件。希望能够概括媒体与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比如媒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媒体在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媒体所构成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等。个别传媒虽然从表面来看只是一个实体,但是它包含了太多的国际事件、国际意义和国际关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现象。

国际事件浩如烟海,与大众传播和传媒有关的事例也不胜枚举,为了便

于筛选或选择一些有代表性和现实意义的国际事件,本书所选事例的时间始自 20 世纪 50 年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现代”以来,所以本书的标题使用了“现代重大国际传播事件”,希望不会给读者的认识和思维造成麻烦。其实,现代以来还有很多重大事件属于本书选择的范畴,限于编著者目光短浅,暂且先止于此。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特点。打开目录,17 个重大国际传播事件中有 9 个直接是关于美国的,占了全部内容的一半,还有 6 个以上或多或少与美国有关系。这说明了一个道理,在现代世界历史版图中,美国的分量举足轻重,美国的身影无处不在。所有这一切源于二战后美国主导世界格局的形成,源于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还是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还有一句话,要主动融入国际社会。没有强大的实力,就不会对世界形成影响,就不会成为世界的主角;不进入这个“话语场”,就不会主导舆论,就不会掌握话语权。尽管可能会因此惹上许多麻烦,但是毕竟是主角。中国有能力成为主角,也已经在慢慢地成为主角。

本书所选事件中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大事件,本书从传媒的角度重新回顾这些故事;有的则直接反映为一场国际传播事件。在每一个“故事”后面,编著者特别进行了评点,从自己的角度对这些国际事件进行了分析和思维延伸。所选事件依各事件的发生时间先后为顺序。由于所介绍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历史事件,许多文字内容不得不摘录于其他记载和报道。所幸所有内容都是“现代”的历史事件,这些事件的知识产权不专属于某一书、某一报和某一网,权当本书是“某一刊”对以上事件的转载,当然需要注释的地方都作了必要的注释或引用说明,有些没有直接注释的则在书后列出参考书目。感谢所有被引用文字的作者、记者和首创者们!其他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谅解。

编著者

2013 年 12 月

1	被媒体终结的战争——越南战争
11	为话语权而战斗——“国际新闻传播新秩序”之争
27	属于CNN的战争——海湾战争
42	妖魔化敌人——“死亡屋”事件
51	让总统面临弹劾——克林顿性丑闻
63	和军方保持一致——科索沃战争
76	互联网上的战火——中国“红客”
94	全方位报道战争——伊拉克战争
110	人人都是报道者——“虐囚门”事件
124	谁报道重要还是报道谁重要——凯利之死
139	《新闻周刊》的尴尬——美军亵渎《古兰经》
151	小漫画引起大冲突——丹麦漫画事件
164	媒体就是主角——BBC的故事
181	另一个主角——“半岛”涛声
194	新闻界的“无间道”——新闻集团窃听丑闻
208	胳膊想拧过大腿——“维基解密”
221	文明的冲突——电影风暴
229	参考文献
231	后 记

被媒体终结的战争——越南战争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是美国人心头永远的痛，“越战泥潭”成为口头禅。然而，美国新闻媒体在这场战争中的不俗表现却是美国新闻界人士引以为荣的光辉事件。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的新闻媒体使美国得以从越战的泥潭中脱身。

越南战争(1961—1975 年)，简称越战，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由于媒体的介入，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电视战争”。

奠边府战役的胜利彻底将法国人击溃，法国人被迫从北部和南部陆续撤军。在 1954 年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与会各国签订了关于在越南、柬埔寨停止军事行动的《日内瓦协议》。《协议》明确表示要尊重越南等三国的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然而，美国拒绝在该协议上签字。

不久，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声称如果印度支那陷入共产党统治，东南亚其他地区将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很快陷落。鉴于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考虑，艾森豪威尔在法国撤离印度支那后开始大规模援助及扶持吴庭艳政府。

1956 年春天，随着法国驻越南军队的撤出和印度支那法兰西联邦部队总司令的解散，美国对越南的干涉更加赤裸。

3 月 14 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亲自前往西贡，同吴庭艳一道确定了在越南全国实行自由选举的方针。他还保证美国将在由此而引起的任何印度支那的危机中，对越南提供军事援助。

1956 年 6 月 1 日，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在“美国越南之友社”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公开宣布美国将继续给予南越军事援助，并且坚决支持南越政权拒

绝参加有关越南统一问题的协商。

与此同时,美国进入南越的军事人员日渐增多。

1961年5月,美国派遣100名代号为“绿色贝雷帽”的所谓“特种部队”进入南越。

1962年2月8日,美国在西贡设立了由保罗·哈金斯将军指挥的军事司令部,标志着美国开始直接介入越南战争。4月30日,美国副国务卿乔治·鲍尔宣布了一个名叫“战略村”的计划,随后,美伪军开始对各“战略村”进行残酷的扫荡和围剿。

越南南方游击队进行了反“战略村”、反扫荡的战斗。据统计,从1962年到1964年,越南南方游击队的反扫荡斗争进行了40余次,美军伤亡达2000余人。到1964年,越南南方游击队解放了南方三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和700万人口,美国军事介入严重受挫。

1963年11月1日,美国在南越策动军事政变,杀了吴庭艳,换上了新的傀儡杨文明,并积极寻找扩大战争的借口。

1964年8月,美国制造“东京湾事件”,这是美国介入越南战争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性事件。为了阻止越南北方对越共游击队的物资和人员支持,南越海军对越南北方沿岸海军基地进行袭击。美国海军也派出舰艇协助,进行电子战支持。1964年8月2日,一艘执行任务的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遭到越南北方鱼雷艇袭击,美国随即轰炸越南北方海军基地作为报复,这就是著名的“东京湾事件”(也称“北部湾事件”)。越南北方和美国双方都把它看作是对方的蓄意攻击,并作出了强硬反应。越共游击队对多处美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攻击。越南北方325师进入南越集结,标志着越南北方正规军(越南人民军)对南越的公开进攻。美国国会则通过了“东京湾决议案”,授权总统可以采取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手段对付这一挑衅行为。这事实上给予了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不经宣战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

1965年4月3日和4日,美军在清化战役中遭受重创。从1964年到1965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军和游击队机动作战,进行了一系列奇袭战、伏击战、攻坚战、围点打援和反扫荡战。据初步统计,南方军民共歼灭美军近6000人,超过1961年到1964年12月底所歼灭的美军总数的一倍。

1967年7月底,南越政府将武装力量增加6.5万人,总数超过100万人。在8月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约翰逊也公开宣布,把美军在越南的布防人数增加到5万人,到1968年,美军各兵种将达到52.5万人。

1968年1月底,越南北方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春节攻势”。超过8万的越南北方军队和越共游击队对南越几乎所有的大小城市发起了进攻,其规模和惨烈程度令习惯了“威斯特摩兰^①战报”的美国人大为震惊:无数的军事设施和政府建筑被破坏;战斗最激烈的旧京顺化几乎全部被毁;美军溪山基地被围困76天,因为被破坏得太严重,被解围后不得不放弃使用。在这次攻势中,越南北方的损失超过5万人,但到了5月,他们就恢复了进攻的能力。“春节攻势”使约翰逊不得不承认失败。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发表演讲,终止“轰雷行动”,表示美军将逐步撤出越南,并宣布放弃竞选下任总统。1968年6月,阿布拉姆斯(Abrams)将军接替威斯特摩兰指挥在越的美军。

“春节攻势”之后,越战进入胶着状态,但形势对美国越来越不利。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调整了美国的亚洲战略,开始全面收缩美国的力量,因而在越南战场上也是边打边谈边撤。1972年3月,越南北方动员了几乎全部越南北方的军事力量,发动了比1968年“春节攻势”更大规模的“复活节攻势”。尼克松下令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对越南北方进行全面轰炸,然后这种全面轰炸丝毫没有改变美军在战场上的颓势。

1973年1月27日,经过长期谈判,参加“关于越南问题的巴黎会议”的四方(越南、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西贡政权)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两个月后,美军全部撤出越南。越南战争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

1968年的“春节攻势”使越南北方在军事上也付出了较为惨重的代价,然而其最大的成效在于使美国的主流媒体发生了舆论风向的转变,在美国国内酿成了一场公共危机(反战浪潮)。

1968年1月30日清晨,美国白宫收到越共在顺化和西贡以北发动武装袭击的消息。在战事爆发的15分钟之后,设于西贡城内的美联社办事处便火速将这次军事进攻向全世界发出报道。这标志着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的报道进

① 美军当时在南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

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关于战争血腥场面的第一手报道能够及时发出。

1968年3月16日,美军一个连队在连长威廉·卡利中尉的率领下,进入越南广义省的美莱村,开始了持续几个小时的大屠杀。男人被迅速枪杀,女人被强奸后再被杀掉,小孩子则被当作枪靶子。最后,整个村子109名村民无一幸免。战地记者西摩·赫什率先捕捉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惨绝人寰”的消息。不久,一份小报《圣路易斯报》以巨大的标题《在美莱:我们发疯了》刊登了他的文章。第二天,《华盛顿邮报》、《旧金山时报》等36家美国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在全美激起了大规模反战游行,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掀起反战高潮的作用。

当美国白宫希望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主导着社会新闻报道时,公众的意志相反却集中在那些由美联社艾迪尔·亚丹(Eddie Adam)拍摄的或是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工作人员所报道的事件上。在西贡的大街上,南越的将军随手便处死了一名被俘的越共士兵,亚丹的照片就捕捉了那颗子弹发射时令人震惊的瞬间。

这些报道让美国民众看到了在越南发生的那些事件的恐怖与血腥的本质。这种不愉快的现实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民众,使他们产生了许多疑虑:我们的政府究竟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威斯特摩兰也在后来写道:“照片和影像震撼了整个世界,虽然看起来只是在这场大范围残酷战争中的单一事件,但其实是对越南人民心理的一个致命打击。”

在新年攻势开始的几天内,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都进行了电视特别报道,新闻杂志《时代》和《新闻周刊》也进行了相关报道,并配以血腥的图片,其社论以及专栏文章都对美国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了质疑。

例如,沃尔特·李普曼在《新闻周刊》的专栏中写道:“战争转向了不好的一面,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现在正面对着一个常常被忽视的问题,认为它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我们在越南是不是被‘击败’了?这个问题的提出引起了一种震惊,这是一种感受到暴力的震惊,是一种无法估算后果的震惊。”而另一名记者沙丽娜·肯瑟斯(Salina Kansas)在她的社论中写道:“对于一个如此傲慢的国家来说,是很难承认失败和错误的。但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正直而又高贵的民族,我们就不配再继续杀戮和破坏,因为这样只能使我们

的罪责更加深重。”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 1968 年 2 月 27 发表的一篇由沃尔特·克朗凯特从越南发回的电视现场报道同沙丽娜为报纸所提供的消息一样,但其观众却高达数百万。克朗凯特在越南完成了近半个小时的报道后,发表了最终分析:在大规模的越南战场上,谁是胜者,谁又是败者呢?我不知道。越共并没有击败敌手而获得胜利,但我们同样也没有。也许历史会把它判为一场平局。

相反,美国政府则竭力使公众相信美军在越南战争中并没有进行大规模撤退,而且国家对战争的态度丝毫不会动摇,但这种努力却遭到了另一篇新闻报道的冲击。这次意外事件是由 1968 年 3 月 10 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威斯特摩兰仍需 20.6 万士兵,激起政府内部争论》所引起的。

这篇文章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第一,这种向越南派出更多部队的请求使得公众对美国的战争政策产生了怀疑。第二,“政府内部争论”给公众留下了一个杂乱无序的印象,进而弱化了政策制定者在公众心中的影响力。

同一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高级记者弗兰克·迈奇(Frank McGee)用一段针对大规模军事增援前景的评述结束其联播:“那些应该被改变的可能只是破坏力的提高……不管其他的观点如何,是时候由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了拯救整个越南而摧毁它是否真的具有意义。”

迈奇的评论同克朗凯特的评论一样,都是通过电视广播来影响公众的意志,从而激起人们对越战的厌恶。丹尼尔·哈林曾指出:“在越南战争爆发后的两个月内,新闻记者电视报道中进行的社论和评述的比例从战前的 5.9% 蹿升到 20%,而随着战争的结束,这一比例又降回到了 9.8%。”

新闻报道对公众意志所产生的与日俱增的影响总是很难衡量的,但在“春节攻势”后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了美国民众对战争的认识在发生改变。1968 年 2 月份进行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支持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战争政策的人数比例下降到了 35%;而在越南战争爆发初期,称自己是鹰派的人数曾蹿升到 61%。美国的鹰派和鸽派都不欢迎约翰逊。在 3 月中旬前,民意的态度更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公众中公开表明是鸽派的人数第一次远远超过了鹰派。盖洛普的数据也表明,在 2 月初和 3 月中旬这段时间内,几乎 20% 的公众由鹰派转向了鸽派。此外,在 1968 年 2 月份最后一周进行的一项

盖洛普调查中,人们发现,其实从上一年的11月就开始了一场戏剧性的转变。在这场民意的转变中,新闻报道通过对美国军事政策详尽的分析与揭露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1971年出版的论文集中,约翰逊总统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我们的新闻报社和电视台对越战进行了太多感性的、夸张的报道。媒体好像在比看谁能刊登更多耸人听闻和令人沮丧的报道。专栏作家对美国卷入东南亚事端并没有产生丝毫担忧,反而把报道这种事态当作一种时髦。一些参议院的批评者和大量反对美国进行战争的反对者也加入到为失败唱颂歌的行列中。美国公众甚至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在每天无望而且近乎疯狂的一大堆批评面前,都开始认为我们这一次必定会尝到失败的苦果。”

但是,林登·约翰逊也似乎在其进攻性防御政策和该政策的不确定性间摇摆。约翰逊似乎在心理层面上被击败了。他后来这样写道:“当我宣布越南战争中敌人是军事上的失败者的时候,我不得不再加上一句:‘但他们的第二目标,很明显取得了心理层面上的胜利’。”

克朗凯特的报道给了约翰逊重重一击。约翰逊对他的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George Christian)说,克朗凯特的报道可能会改变那些“一直以来都支持战争的公众”的立场。他说:“这是一个转折点……假如我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美国大众(因为克朗凯特是当时美国最受民众信赖的‘新闻先生’,CBS著名的晚间新闻节目主持人)。”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宣布,他将退出1968年的总统连任竞选,大大限制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并提出在巴黎举行预备性和平谈判的计划方案。这一计划在当年5月就付诸实施。至此,新闻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的现场报道彻底改变了美国政府对越南北方的军事政策。约翰逊总统屈从了媒体所代表的民意。

在世界战争史上,越南战争是传媒报道最为出色的少数战争之一。20世纪60年代电视媒体蓬勃发展,电视在西方普及,战争也进入了电视时代,美国政府缺乏对这一崭新媒体的充分认识。1968年“春节攻势”期间美国传媒对战争的报道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加,而且在报道的内容上也相当丰富和开放。“春节攻势”期间传媒报道的表现和特点主要有三:

首先,传媒特别是电视媒体把战争恐怖、惨烈、血腥、残忍的一面带到了千家万户。“春节攻势”期间,如果一位电视爱好者每周能看上5次晚间新闻的话,那么他平均就会看到3.9次平民伤亡和城市被破坏的镜头,这是整个越南战争期间平均数0.85次的4倍。军事伤亡的镜头由每周2.4次上升到6.8次。可以这么说,战争残暴的一面在电视上得到持续报道,这还是第一次。而电视媒体的直观性往往更能感染民众情绪,“证明首都遭到破坏的几间正在燃烧房屋的画面,伴以语调忧伤的解说词,不可避免地造成这样的印象。这就是西贡发生的一切。”

其次,“春节攻势”期间的许多报道是相互矛盾的。“春节攻势”刚开始时,越南北方解放武装力量的一支突袭队猛攻了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对这则新闻的报道就不一样。美联社记者发回国内的新闻快报认为突袭队一度占领了大使馆,说:“截止到(西贡时间)上午8点55分,美军已经收复使馆外面的广场,士兵们正在试图攻进大楼内消灭残余的越共(美国东部时间晚上9点)。”而合众国际社的报道则有所不同,“越共突袭队向大使馆发射了一串迫击炮。他们攻进了使馆大院,但并没有进入使馆大楼”。

最后,“春节攻势”期间战争报道有时并不遵从官方路线。在美国军方和政府看来,“春节攻势”是河内的孤注一掷之举,并使得越南北方遭受了惨重的军事损失。然而美国记者们普遍认为,尽管越南北方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他们的心理和政治上的目的达到了。正如《纽约时报》的记者汉森·鲍德温在1968年2月1日的报道中所说的那样,“尽管敌人的损失非常惨重,但是他们的目标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军事上的,其目的是影响这个国家的公众舆论走向”。另外,记者们对越南战争的整个战争进程的看法也并不像官方那么乐观,正如克朗凯特在一次越战专题节目中所讲到的那样,“看来唯一切合实际但不能令人满意的结论是:我们陷入了困境……唯一的合理出路在于谈判,而不是以胜利者自居。”传媒报道的主题并不是宣传美军的军事胜利成果而是都集中在一些和军事不相关的问题上了,比如南越政府的无能,越共突然降临到民众身边所带来的心理影响等。

从当时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资料看,这几乎是一场被美国媒体定义为失败的战争。报纸、电视将烽火连天的越南战争带到了美国民众的书桌、起居室,新闻

界的笔杆、镜头廓清了美国军方撒下的黑幕，颠覆了美国对南越外交政策的民意基础。越南战争结束后有观察家声称这是第一场发生在起居室的战争，是一场电视化了的战争。电视化意味着民间和军事的二元对立的结束，公众现在参与战争的每一个阶段，最重要的战事通过电视直接向美国民众披露。也就是说，美国民众通过电视新闻，在起居室里近距离地接触了越南战争现场的画面后，产生了厌战情绪，掀起反战高潮，最终促使美国总统尼克松撤出越战泥沼。有人甚至说，美国在越战中不是败于炮弹，而是败于“纸弹”；不是败于战场，而是败于起居室。

评点

说起越南战争，我们马上会联想起很多概念：越战泥潭、起居室战争、越南后遗症、美莱村、莫利·塞弗、克朗凯特等等。所有这些概念又都会让人把目光从战争本身转向新闻媒体。是的，没有越战，就不会有如日中天的新闻媒体；没有新闻媒体，越战的结果就可能不会是那样。我们的思维似乎在不知不觉之中落入了某些人的圈套：越战结束以后，美国军方一直有人认为是美国的媒体而不是越南北方和南方的游击队打败了美国。他们不厌其烦地向人们灌输这样的观点，其目的不外乎两点：其一是为军方自己的无能进行开脱；其二是为自己的失败寻找替罪羊。

战争的爆发、进行、结束固然会受某些偶然的或外在的因素影响，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必然是战略、战术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以及决策者的意志、决心和受支持程度。在现代社会，一场战争能否顺利进行，能否取得预期的胜利，关键是要看战争的性质如何——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最好的说明——正义的同盟国战胜了非正义的轴心国。美国自己在二战以后又发动了许多次“正义”的战争。但是，正义不正义，显然不是发动战争的一方说了算的。1950年美国就曾通过联合国决议，纠集联合国的一些会员国在朝鲜发动了一场代表“国际社会”的“正义”的战争。结果，“正义”的战争并没有取得正义的战果。不过，对于发动战争的一方来说，战争本身是否正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把自己打扮成为正义之师。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因此，自从有了现代大众传媒以来，任何的战争贩子或战争发动者们就都懂得了如何

去打扮、粉饰、伪装自己的技术。大众传媒从此成为一种特殊的武器，也成为—个特殊的阵地。

越南战争是个例外，就连美国政府和军方也清楚，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实在是说不出口。但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同样清楚，这场战争需要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民众的支持成为越南战争的最后底牌，而民众的支持则建立在媒体所提供的战争进程的乐观新闻报道的基础上。这就是为什么在战争初期人们所看到的关于越南战场的新闻报道基本上都是与政府和军方口径一致的原因。

但是，新闻媒体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刺杀敌人的同时，常常也会对持剑人自身构成威胁。一旦媒体改变立场，或者不再与政府和军方保持一致，政府和军方的麻烦也就随之而来了。正如约翰逊后来所哀叹的：如果我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这个国家。

一切源自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们的介入。

媒体对战争的影响是逐渐展开的，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形成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军还没有进入越南时，美国的战地记者就已经进入越南了。大名鼎鼎的罗伯特·卡帕就是在那时牺牲的。他成为越南战场上牺牲的第一个美国记者。到70年代战争结束时，一共有135位战地记者在越南战场上殉职，成为战地记者死亡最多的一场战争。

不能否认，在这些死去的战地记者，还有其他活着的战地记者中，有许多人不仅仅是在为国家工作着，而且更为职业和道义工作着。职业精神和社会道义成为他们最后的信念，最终战胜了各种外部的压力和自身的怯懦。1965年8月8日，《CBS晚间新闻》播出了一段由前方记者莫利·塞弗采集的电视报道。节目真实地再现了美军一只部队在锦尼村进行扫荡过程中如何放火焚烧了无辜的村民的房舍，摧毁了整个村庄。节目马上在美国国内引发了爆炸性的反应。许多人纷纷谴责塞弗的叛国行为。总统约翰逊打电话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经理，责骂塞弗“在美国国旗上拉屎”，随后下令对塞弗这个“共产党人”调查。但塞弗最终还是获得了新闻界给他颁发的奖章。

其他的记者和新闻报道虽然没有莫利·塞弗那样惊天动地，但他们一样在慢慢地消磨着美国人毫无内容的“爱国”情绪。像拉里·伯罗斯的《生存还是死亡》，霍斯特·法斯的《父亲的悲哀》，唐纳德·迈卡林的《嗨，爱人》等许多摄影